

拉美政治

移民、租佃制与阿根廷 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

金晓文

内容提要：国内学界对于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认知基本建立在现代化的维度上，认为现代化推动了民众主义的兴起。然而在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崛起的过程中，阿根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现代化转向，而现代化本身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用现代化的框架分析民众主义容易将“现代化”的概念泛化。事实上，在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些关键性节点往往会打破原有的发展路径，进而导致重大变革的出现，如1912年爆发的“阿尔科塔的呼声”正是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一大关键性节点。此前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牧业的生产与出口，移民与农业租佃制是保证农牧业生产的关键。但随着阿尔科塔农民运动的发生，佃农的抗争导致原有的农牧业生产出现危机，阿根廷社会进而陷入萧条与动荡中，致使执政的民族自治党遭遇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政治权威受到侵蚀的情况下，激进党利用政见主张的模糊性和民族主义策略吸引各阶层的选民，并最终在1916年成功上台执政。从这一角度而言，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并非现代化的产物，而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寻求权威重建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阿根廷 移民 租佃制 激进党 早期民众主义

作者简介：金晓文，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1)01-0059-25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拉关系的影响研究”（编号：19ZGC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政治学）”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

自20世纪以来,民众主义(populism)是阿根廷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①从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领导的激进党(Unión Cívica Radical)的崛起到基什内尔夫妇的上台执政,民众主义长期影响着阿根廷的政治进程。伊里戈延及其执政时期被认为是早期民众主义的代表,尽管国内外学界对是否应将伊里戈延主义归入到民众主义的范畴之中尚存在一定争议,但无论是激进党的动员方式,还是将伊里戈延塑造成魅力权威型领袖,基本都符合拉美民众主义的特征。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此之后崛起的阿根廷经典民众主义领袖庇隆在理念和动员方式上都大量吸纳了激进党的元素。^②因此,对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划分也应当包含以伊里戈延为代表的早期民众主义。

就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认知而言,国内学界大多建立在现代化的视角之上,认为现代化为民众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契机。^③然而,用现代化的视角来解释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忽视了两大问题。第一,在激进党崛起阶段,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现代化转向。一方面,农牧业生产依然是阿根廷的经济支柱,财富的最主要来源也依旧集中在农村,即使在激进党上台执政后,也基本延续了原有的政策方略,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激进党第一次执政结束后,这种状况才逐渐发生转变。^④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并非完全是工业化的结果,在一战前阿根廷的城市工人还在不断往

① “民众主义”这一概念无论是在译名、内涵还是主要成因等方面,学界至今仍存在较大分歧。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阿根廷民众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中进行过相应分析,本文对民众主义的认知即建立在该文基础之上。参见金晓文:《阿根廷民众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第54-74页。

② Joel Horowitz, *Argentina's Radical Party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1916-1930*,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

③ 国内学界最为系统研究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学者是潘芳,她指出:“民众主义本身就是阿根廷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伊里戈延时期的民众主义只是阿根廷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产物。”董国辉同样将伊里戈延及激进党的兴衰置于现代化的视角下进行审视,并将其归入“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维度。事实上,国内学界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研究大多以“现代化”作为基本框架,例如董经胜指出,拉美民众主义“反映了拉美作为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积累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秩序与参与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韩琦等人同样指出:“拉美民众主义运动是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产物,该时期的一些旧的社会经济发展‘瓶颈’需要借助民众主义运动来打破”,不一而足。因此,本文所论及的现代化视角正是建立在这些学者先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参见潘芳著:《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董国辉著:《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董经胜:《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众主义》,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第30-38页;韩琦、宋欣欣:《试析秘鲁民众主义发展的“悖论”》,载《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第83-90页。

④ Roy Hora, “Landowning Bourgeoisie or Business Bourgeoisie? 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Argentine Economic Elite, 1880-1945”,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4, No. 3, August 2002, p. 614.

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以获取更高额的农业性收入。^①很大程度上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不是因为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是在农村所能获取资源的空间变得愈发狭小^②；人们不得不进入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地方寻找出路，并等待下一个农业收获季的到来。^③因此，用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容易将“现代化”概念泛化。^④

第二，尽管以伊里戈延为代表的激进党人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等新兴力量的支持，打破了原有以大地主阶层为代表的保守派所垄断的政治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党的崛起、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在反驳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的论断“更大的社会—经济发展 = 更大可能性的政治民主”时就曾经指出，南美的政治权威主义而不是政治民主更可能是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生物^⑤，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本身并不构成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必然条件。

事实上，作为一种宏观性分析框架，现代化的视角往往会忽略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特定“关键性节点”所施加的影响。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就提出了政治发展会被关键性节点所打断的观点，并认为这些关键性节点将会塑造社会生活的基本轮廓。^⑥而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关于国家危机的研究中也指出，比起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预期将来会出现的问题，突发性重大问题更容易激发起人们的能动性，进而激发

① Joel Horowitz, *Argentina’s Radical Party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1916–1930*,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

② Roy Hora, “Landowning Bourgeoisie or Business Bourgeoisie? 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Argentine Economic Elite, 1880–1945”,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4, No. 3, August 2002, p. 609.

③ Blanca Sánchez-Alonso, “Making Sense of Immigration Policy: Argentina, 1870–1930”,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6, No. 2, May 2013, p. 613.

④ “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本文所论及的“现代化”建立在学界形成的普遍认知基础之上，即认为现代化是提升一国经济和政治能力的进程，通过工业化提升经济能力并通过官僚化提升政治能力，其核心过程是工业化。因此，国内学界才会认为拉美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较长时间。参见[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严挺译：《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页；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6–27页。

⑤ [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著，王欢、申明民译：《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⑥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 251.

一个国家做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① 因此，对于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打破民族自治党长期垄断的政治权力这一历史性变革而言，同样也应当关注关键性节点的作用。

从国内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这一时期的关键性节点，学者们基本只关注到1912年阿根廷颁布的《萨恩斯·培尼亚法案》（Ley Sáenz Peña），而鲜少提及同年发生的“阿尔科塔的呼声”（El Grito de Alcorta）对阿根廷社会造成的冲击。实际上，阿尔科塔农民运动所展现的是一场社会危机，并至少体现了三层重要意义。一是阿根廷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问题，进而导致国家的发展模式陷入困境；二是在经济危机的传导下，以阿根廷农村协会和大地主阶层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受到了新兴势力的挑战，这就意味着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面临着重塑；三是绝大多数的农民运动参与者均为外国移民，这场农业生产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本土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隔阂，使阿根廷不得不面对新的民族构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萨恩斯·培尼亚法案》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激进党潜在的选民基础，而阿尔科塔农民运动则为激进党的崛起创造了权力空间与政治动员的议题。

正如美国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指出的，多数重大改革的发起都伴随着重大失序的发生以及精英阶层控制、规范这些社会失序的仓促行动。^② 这就意味着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兴起也并非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而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重塑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因此，本文将“阿尔科塔的呼声”这一关键性节点作为出发点，试图提供一种关于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不同视角。

一 1912年前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基础

1880—1912年间，阿根廷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除了少数几年外，这30多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5%。^③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① [美] 贾雷德·戴蒙德著，曾楚媛译：《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96页。

^②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著，袁子奇译：《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③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67页。

Arthur Lewis) 甚至认为, 阿根廷能够与日本竞争 1880—1913 年间全球增长最快国家的称号。^① 这一时期阿根廷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农牧业的繁荣。一方面农牧业出口成为阿根廷财富收入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农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外资本的进入, 进而促进阿根廷的国内建设。然而, 阿根廷的农牧业发展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为了推动农牧业产出的不断提高, 必须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持续投入。为此, 在 1862 年实现正式统一后, 阿根廷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增加生产要素的供给。

在土地资源方面, 尽管阿根廷幅员辽阔, 但当时有大量土地为原住民所控制。为了扩大土地的可利用范围, 1879 年时任总统阿韦利亚内达 (Nicolás Avellaneda) 授权胡里奥·罗加 (Julio Argentino Roca) 将军发动“征服荒漠”行动。这次行动不仅彻底赢得了对原住民的优势, 终结了原住民对于农村地区的安全威胁, 还获得了对潘帕斯和巴塔哥尼亚地区的控制权, 使阿根廷政府收获了超过 800 万公顷的土地。^② 而在劳动力资源方面,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 阿根廷政府就通过一系列措施明确鼓励来自欧洲的移民, 联邦政府甚至在 1888—1890 年间为 13.2 万名欧洲移民支付了跨洋旅费。^③ 由于当时欧洲受到社会动荡和工业革命加速的影响, 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不少农民很难在本国立足。受到阿根廷吸纳移民措施的影响, 自 1870—1914 年间, 共有约 600 万移民进入阿根廷, 外国人在该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也从 1869 年时的 12.1% 上升到 1914 年的 29.9%。^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10 年间, 仅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西班牙人就要比西班牙 300 多年殖民统治期间抵达西属美洲的移民总数还要多。^⑤ 移民的到来不仅为阿根廷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资源, 也深刻改变了该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基础, 阿根廷至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径。

(一) 移民与农业生产的多元化

在殖民统治时期, 阿根廷长期处于西班牙帝国的边缘地带, 其经济发展

① [美] 阿瑟·刘易斯著, 梁小民译:《增长与波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 第 283 页。

② Jill Hedges, *Argentina: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 22.

③ Carl E. Solberg, *The Prairies and the Pampas: Agrarian Policy in Canada and Argentina, 1880 - 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6.

④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5 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第 346 - 347 页。

⑤ [美] 何塞·C. 摩亚著, 冯高峰、师嘉林译:《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的移民、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一个全球的和新世界的视角》,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 138 页。

主要依赖波托西银矿的开采和出口。尽管到了殖民统治后期阿根廷的农牧经济有所发展，但在19世纪初，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贸易出口中农牧产品的比重依旧只有20%，其余将近80%的出口仍然依靠玻利维亚开采的白银。^①然而，伴随着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终结以及玻利维亚的独立，阿根廷不得不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为此，阿根廷开始转向以养牛业为核心的畜牧经济发展，至19世纪中叶，牛皮出口几近占据该国对欧洲出口商品的2/3^②，并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投入。例如阿根廷著名的富豪安乔雷纳（Anchorena）家族在1820年后也开始把部分资金从海外贸易转移到牧场经营中。在1822—1826年间，该家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掌握了近40万公顷的土地^③；至1864年，该家族在潘帕斯地区拥有的牧场土地面积已经超过93万公顷，打造了一个最大的养牛集团。^④

尽管如此，当时阿根廷的农牧经济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导致农牧业生产规模受限以及出口产品的单一化。直至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阿根廷政府开始大规模吸纳欧洲移民的进入并投入到农牧业生产中，阿根廷的农牧经济才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首先，阿根廷的畜牧业生产中养羊业的比重得到大幅提升。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西班牙殖民者担心殖民地养羊业的发展会对西班牙本土带来冲击，故而限制高品质羊的引入；另一方面，在原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羊驼制品的流通与使用较为广泛，对于羊制品的需求较小。再加上同养牛业相比，养羊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在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养羊业因此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9世纪中叶后，随着欧洲市场的需求增加，以英国、德国为首的外国投资者逐渐关注到阿根廷的养羊业，继而先后向阿根廷引入了朗布埃埃羊、林肯羊、罗姆尼沼泽羊、科里厄达勒羊等更高质量的绵羊^⑤，阿根廷养羊业才开始受到青睐。伴随着羊毛价格的升高以及欧洲移民的不断进入，阿根廷本

① Leslie Bethell (ed.), *Argentina since Indepe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

② Roy Hora, *Historia Económica de la Argentina en el Siglo XIX*,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2010, p. 95.

③ Roy Hora, “Los Anchorena: Patrones de Inversión, Fortuna y Negocios (1760–1950)”, en *América Latina en la Historia Económica*, No. 37, enero–abril de 2012, p. 44.

④ [美] 乔纳森·C. 布朗著，左晓园译：《阿根廷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11页。

⑤ [阿根廷] 费德里科·A. 道斯著，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阿根廷地理》翻译组译：《阿根廷地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4页。

土畜牧业生产者也纷纷大规模涉足养羊业。以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为例,1810年当地的绵羊数量约为200万~300万头,到了1852年已增至1500万头,至1865年数量更是高达4000万头;而羊毛的出口量也从1829年的333.7吨增至1850年的7681吨,到1870年甚至超过了6.57万吨。在19世纪60年代后,当地羊毛的出口额已经超越牛产品成为阿根廷主要出口商品^①,并一直持续至20世纪初。

其次,粮食生产成为阿根廷农牧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19世纪中叶以前,阿根廷的农产品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例如谷物需要从美国、智利、澳大利亚进口,油类产品则需要从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进口^②;即使到了1871年,阿根廷畜牧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依然高达98.3%,农产品出口仅为0.1%^③,这表明阿根廷经济发展中农产品生产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然而,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对于这些资本较少且能够获得土地规模较为有限的移民而言,较为容易着手的是进行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生产。为此,在圣菲省、恩特雷奥斯省等土地资源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的潘帕斯地区,大量移民开始从事粮食生产,这就大大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以玉米出口为例,1880年阿根廷的出口量仅为1.5万吨,但到1913年出口量已经达到480多万吨;小麦出口在1877年仅为200吨,但到1913年已经上升到281.2万吨;亚麻籽在1878年开始出口时出口量仅为100吨左右,然而到1913年出口量已经超过101万吨。^④至1914年前后,阿根廷在小麦、玉米、亚麻籽、苜蓿等产品出口方面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玉米和亚麻籽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小麦出口位居世界第三^⑤,燕麦、大麦、黑麦等农产品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该国出口产品中,20世纪初农产品的占比和畜牧产品的占比已经几近相当,分别为47.8%和48.4%,并最终在1910年

① Leslie Bethell (ed.), *Argentina since Indepe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6.

② Mario Margulis, “Inmigración y Desarrollo Capitalista. La Migración Europea a la Argentina”, en *Demografía y Economía*, Vol. 11, No. 3, 1977, p. 285.

③ Roberto Cortés Conde, “La Expansión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Entre 1870 y 1914 y el Papel de la Inmigración”, en *Cahiers du Monde Hispanique et Luso-brésilien*, No. 10, 1968, p. 74.

④ B. 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1750–2005*, Sixth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294, pp. 315–316.

⑤ 董国辉著:《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71–72页。

超越畜牧产品成为阿根廷出口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①

事实上，由于劳动力供给的不断提升，除了潘帕斯地区以外，在阿根廷其他农业生产地带同样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进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例如在图库曼省，该省在19世纪70年代后经历了蔗糖生产的大发展，蔗糖生产从1877年的约3000吨跃升至1895年的近11万吨，1914年更是达到27万吨，成为该省最主要的生产作物。1895年，阿根廷首次实现蔗糖供应的自给自足，图库曼在其中就贡献了超过80%的份额。^②而在门多萨省，作为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的重要地带，19世纪上半叶曾经一度衰弱的生产得到复苏，葡萄园面积从1876年的250英亩发展到1890年的1.6万英亩，至1910年更是达到11.2万英亩^③，成为该省发展的重心。即使在先前人烟稀少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这块原本仅有原住民居住的区域到19世纪末也已成为羊毛的重要产区，当地的羊群规模从1895年的约106万头上升到1914年的近1036万头^④，规模扩大了约9倍。很大程度上，移民的到来有效地促进了阿根廷农牧经济的发展，使该国农牧业生产变得更为多元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农业生产的主要形态

随着移民的大量到来，移民群体逐渐成为阿根廷农业生产的核心力量。根据1914年的统计数据，在该国粮食生产地带，拉潘帕省的农业生产者中有87%为外国移民，圣菲省的这一比重达到79.8%，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科尔多瓦省的占比同样高达69%和65.8%。^⑤然而在这些移民中，有大量农业生产者并非土地所有人。有数据表明，在潘帕斯地区的土地形态中，1909—1910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私有土地占28.91%，科尔多瓦省的私有土地占28.66%，拉潘帕省的私有土地占25.44%，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私有土地

^① Roberto Cortés Conde, “La Expansión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Entre 1870 y 1914 y el Papel de la Inmigración”, en *Cahiers du Monde Hispanique et Luso-brésilien*, No. 10, 1968, p. 74.

^② Patricia Juárez-Dappe, *When Sugar Ruled: Economy and Society in Northwestern Argentina, Tucumán, 1876-1916*,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3, p. 46.

^③ James R. Scobie, *Argentina: A City and a N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44.

^④ Osvaldo Barsky y Jorge Gelman, *Historia del Agro Argentino: Desde la Conquista Hasta Fines del Siglo XX*, Buenos Aires: Grijalbo Mondadori, 2001, p. 219.

^⑤ Carl Solberg, “Rural Unrest and Agrarian Policy in Argentina, 1912-1930”, 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3, No. 1, January 1971, pp. 28-29.

占 42.47%^①，这意味着私有土地并非潘帕斯地区农业生产中的最主要形态。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移民而言，未能成为土地所有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 1880 年后，潘帕斯地区的土地价格开始大幅攀升，大部分移民在此后无力承担购买土地的价格。在移民大量到来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土地大多已为本地畜牧业生产者所占有，移民大多只能前往土地尚未大面积开发的圣菲省等地寻找生计。^② 随着移民大规模的进入以及土地占有速度的加快，这些地区的土地价格在 1880 年后也开始大幅上涨。在拉普拉塔河沿岸国家，1870—1913 年间土地价格猛涨了 10 倍以上^③；而在阿根廷，1881—1911 年间沿海省份的土地价格也平均上涨了 218%^④，这就使大量移民只能通过承租土地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二是大部分移民的到来并不是为了在阿根廷定居，赚钱回家购置地产或扩大自家土地是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农村人口向阿根廷移民的重要驱动力。^⑤ 为此，一战前外国移民在阿根廷的流动性较大。有数据显示，在 1871—1914 年间，阿根廷入境移民人数约为 600 万人，定居的人数将近 320 万人^⑥，流出的比重接近 50%，这也表明部分移民并不倾向于购买土地。

在这些无地的移民生产者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短工 (jornalero)，即临时性雇佣人员，一般在每年农忙季节进入农业生产地带进行劳作，平时则另谋他路。其中，短工中有不少为“燕子移民”(golondrina)，即作为季节性移民奔波于欧洲和阿根廷两地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为意大利人。这些移民在每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到阿根廷进行耕种，1 月后又重新返回欧洲

① Noemi M. Girbal de Blacha, "La Granja: Una Propuesta Alternativa de Coyuntura para el Agro Argentino (1910-1930)", in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Vol. 14, No. 28, 1989, p. 90.

② James R. Scobie, "Una Revolución Agrícola en la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3, No. 1/2, April - September 1963, p. 115.

③ [乌拉圭] 路易斯·贝尔托拉、[哥伦比亚]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著，石发林译：《拉丁美洲独立后的经济发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年，第 145 页。

④ James R. Scobie, "Una Revolución Agrícola en la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3, No. 1/2, April - September 1963, pp. 125 - 126.

⑤ [美] 何塞·C. 摩亚著，冯高峰、师嘉林译：《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的移民、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一个全球的和新世界的视角》，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45 页。

⑥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5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374 页。

进行劳作，并没有在阿根廷定居的意愿。^①这一群体大多由佃农所雇佣，每天工作时间在16个小时以上，工资收入较低。^②即使如此，只要他们能在阿根廷农村中找到工作，在19世纪90年代“燕子移民”一般仅需工作两周就能赚回往返的船票费用^③，工作更长时间便可获得额外收入，因此也就有大量移民奔波于大西洋两岸。

第二类是分成农（medianero），相对于短工而言这些移民长期在农业生产区进行劳作，但由于缺乏一定的生产资料而成为大庄园中的分成雇农，通过在大庄园中耕种土地或者照看牲畜获得农牧产品的分成，以实现早期的资本积累，牧羊人中的爱尔兰人、巴斯克人就是其中的代表。相对于本国的原住民与高乔人而言，大地主们更倾向于雇佣这些外国移民。一方面，非本国公民可免于征兵，雇佣外国移民能够保证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由于阿根廷精英群体普遍对原住民和高乔人充满歧视，认为其野蛮、落后，阿根廷前总统萨米恩托甚至将高乔人视为该国发展的障碍。^④为此，大地主们往往愿意将庄园和牲畜交给外国移民打理，外国移民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也相对更为优越，一些外国出生的牧羊人有时甚至可以获得羊毛、羊脂和羊皮销售收入的一半^⑤，这也使他们能够在一定时间后转化成租佃制下的佃农。

第三类是佃农（arrendatario），这也是当时阿根廷农业生产的核心力量。据统计，在1910—1911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佃农所耕种的土地占59.36%，科尔多瓦省的这一比重达到57.39%，圣菲省和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占比也达到54.59%和42.19%^⑥，佃农在潘帕斯地区的农业生产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农业租佃制也成为当时阿根廷农业生产的核心。相对于分成农而言，佃农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也能够自主安排农业生产，但由于缺

① Osvaldo Barsky y Julio Djenderedjian, *Historia del Capitalismo Agrario Pampeano: La Expansión Ganadera Hasta 1895*,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2003, p. 264.

② Carl Solberg, "Rural Unrest and Agrarian Policy in Argentina, 1912-1930", 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3, No. 1, January 1971, pp. 40-41.

③ James R. Scobie, "Una Revolución Agrícola en la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3, No. 1/2, April-September 1963, p. 135.

④ [美] 谢里尔·E. 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

⑤ [美] 乔纳森·C. 布朗著，左晓园译：《阿根廷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15-116页。

⑥ Noemi M. Giral de Blacha, "La Granja: Una Propuesta Alternativa de Coyuntura para el Agro Argentino (1910-1930)", en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Vol. 14, No. 28, 1989, p. 79.

乏土地资源，必须通过承租的方式获取土地，并以货币或实物租金的形式支付地租。他们承租的土地大致有两种来源。一是政府将闲置的国有土地承租给移民耕种，以此吸引更多劳动力的到来并进行土地开发。例如在恩特雷里奥斯省，当地政府在1857年为移民创建了第一块垦殖区“圣何塞”，并规定承租土地的移民只要在头5年将粮食收成的1/3上缴政府，就能够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受到这一政策的激励，大量移民开始进入当地承租土地，至1888年，该省已经创建了44块垦殖区，移民人数达到约2.7万人。^①

二是大地主和一些掌握私有土地的公司将其疏于管理的土地分块承租给移民，目的是使土地收益最大化，这也是潘帕斯地区承租土地的最主要来源。在这一承租模式下，承租土地面积普遍为80~200公顷，租期为3~6年，通常是3年，前几年可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最后一年只能种植苜蓿，以供日后放牧使用。^②土地的出租人在佃农耕种期间每年大致能获得12%~15%的收益，一般每10年土地价值就能提高1000%^③，这也为地主们积聚了大量财富。就佃农而言，尽管相对于分成农来说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佃农也并非是完全自由的群体。中小佃农一般要接受土地所有者的某些附加条件，如佃农的产品必须卖给土地出租人等^④，这也使佃农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剥削。

此外，阿根廷的租佃制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分成租佃，也就是佃农在每一个规定时期内按照产出的约定分成比支付地租，这是阿根廷租佃制中最主要的形式；另一种是固定地租，即双方先商定一个固定的地租费用，并不因收益的好坏而发生改变，这种形式多出现在大地主同私有土地公司或土地中间商订立契约时。由于不少地主并不生活在农村，他们便将土地承租给私有土地公司或土地中间商进行管理。中间商在获得土地后又通过分成租佃的形式二次承租给佃农，并经常要求佃农在他们这里购买保险、包装袋、租用农机设备等，其一年的利润有时甚至能够达到80%^⑤，这也给佃

^① Osvaldo Barsky y Jorge Gelman, *Historia del Agro Argentino: Desde la Conquista Hasta Fines del Siglo XX*, Buenos Aires: Grijalbo Mondadori, 2001, p. 120.

^② James R. Scobie, *Argentina: A City and a N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8-119.

^③ James R. Scobie, *Revolution on the Pampas: A Social History of Argentine Wheat, 1860-191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4, p. 5.

^④ 苏振兴：《阿根廷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载《拉丁美洲丛刊》，1980年第1期，第13页。

^⑤ Carl Solberg, "Rural Unrest and Agrarian Policy in Argentina, 1912-1930", 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3, No. 1, January 1971, pp. 21-22.

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尽管如此，只要在收成较好的年份，佃农们依然能够在租佃制下获得一定的收益。例如在19世纪中后期，没有财产的移民通常在经过三至四季收成后就能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①；而在玉米产区的正常年份，即使佃农需要上缴30%的收成作为地租，其收益依然可以达到199%。^②在阿根廷的许多地方，租佃制甚至成为走向拥有私人土地的中间步骤，像意大利移民瓜松（Giuseppe Guazzone）就凭借这种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者^③，这也使农业租佃制成为移民群体在阿根廷从事农业生产、发家致富的关键。

二 佃农抗争与阿根廷的农业生产危机

随着移民源源不断的进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确定，阿根廷经济也逐渐步入平稳发展的阶段。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同样存在着一定问题。一方面，阿根廷的农牧业生产根本上建立在粗放型的发展基础上，当资源投入逐渐耗竭时，就容易遇到发展上的“瓶颈”。在20世纪后，阿根廷的土地资源几近分配殆尽，粮食种植面积也趋于稳定，但农牧业生产者的人数依旧在持续增加。1901—1910年间，共有将近56万移民进入阿根廷农业生产领域，尽管在1908年阿根廷已经达到粮食种植的巅峰，对于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度也开始下降。此后在1911—1912年间，阿根廷的农业收成较差，但依然有大量移民进入农村，这导致圣菲省等地移民的失业人数较高^④，农业生产逐渐无法达到预期的回报率，移民们只能另谋他路。

另一方面，在农业租佃制下，地主和佃农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地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赚取地租，并不关心农业的实际生产情况。^⑤在这种状况下，

① Carlos Rodríguez Braun, “Early Liberal Socialism in Latin America: Juan B. Justo and the Argentine Socialist Part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67, No. 4, October 2008, p. 589.

② Aníbal Arcondo, “El Conflicto Agrario Argentino de 1912. Ensayo de Interpretación”,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20, No. 79, October–December 1980, p. 363.

③ [美] 马克·B. 陶格著，刘健、李军译：《世界历史上的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4页。

④ Jeremy Adelman, “Una Cosecha Esquiva. Los Socialistas y el Campo antes de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en *Anuario del IEHS*, No. IV, Tandil, 1989, pp. 295–296, p. 315.

⑤ Mario Berenbau, “El Desarrollo de la Agricultura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1, No. 1, April–June 1961, p. 122.

农业生产容易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业生产很难实现技术迭代与革新，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所指出的，在农业租佃制下要使农民用于新要素的额外成本与额外收益相等是不可能的^①，这就导致佃农只会在农业生产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进而使阿根廷逐渐丧失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佃农阶层面临的剥削在不断加深，即使面临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下跌或是自然灾害的影响等不确定性因素时，地主阶层和土地中间商对于佃农的盘剥也并没有减少，这就使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有学者认为阿根廷的租佃制既不同于封建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是一条独特的道路。^②实际上，如果将阿根廷的租佃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照，其基本形态是一致的^③，同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也表明阿根廷的农业发展同样遵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当佃农在这一生产体系中无法再获得收益时，农业生产的危机也就提前到来。

（一）佃农抗争的社会背景

在1912年前，阿根廷的农业生产基本保持增长的态势，无论是地主阶层还是农业生产者，都希望从中获取更大收益。然而，地主阶层的获益建立在对佃农的盘剥上，而佃农的获益则建立在农业丰收的条件下，这就使佃农承受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首先，对于佃农而言，长期固定的土地租赁形式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展开与收益的获得，即使短期遭受损失也能够通过往后的丰收来加以弥补。但随着移民的涌入以及潘帕斯地区土地价格的大幅攀升，地主阶层往往不愿意长期出租土地，而是试图通过短期租约的形式不断调整土地租赁价格，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例如在圣菲省南部各地，土地承租的价格从1904年粮食收成的18%~20%上升至1912年的至少35%^④，这导致佃农承受的地租压力持续上升，并且很少能在同一地方连续耕种四季。^⑤

①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43页。

② 袁兴昌：《阿根廷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变与性质刍议——关于阿根廷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普鲁士式道路”的商榷》，载《拉丁美洲丛刊》，1985年第4期，第38页。

③ 参见张五常著，姜建强译：《佃农理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④ Carl Solberg, “Rural Unrest and Agrarian Policy in Argentina, 1912–1930”, 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3, No. 1, January 1971, p. 23.

⑤ Jeremy Adelman, “Agricultural Credit in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1890–1914”,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22, No. 1, February 1990, p. 84.

其次,伴随着农业收益的持续存在,佃农所承受的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提高。除了地租外,佃农至少还需要负担三方面的成本。第一,农业收获季短工的工资。在农忙时节,佃农一般需要雇佣短工来协助其完成劳作,但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中肉类加工厂等工作吸引力的提升,农村中有时也会存在优质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为此,短工的工资在进入20世纪后相应出现了上升。据统计,在1911—1912年间,圣菲省玉米产地的短工工资比1908—1909年间上升了30%^①,这使佃农的成本大大提升。第二,交易过程中的中间成本。就佃农而言,他们通常无法将农业收成直接运输到市场进行交易,需要依靠中间商完成转卖,中间商为此常常压低价格,甚至提高粮袋、交通运输等成本以赚取更多收益。例如在1909—1912年间,装玉米的粮袋就上涨了0.12分^②,这导致佃农的收益减少了。第三,借贷市场的高额利率。为了快速获取收益,佃农们往往会通过借贷来扩大生产。而阿根廷的银行机构普遍倾向于将资金贷款给土地所有人,特别是大地主阶层,佃农们很少能从正规渠道获得信贷。为此,他们的贷款大多只能通过非正规市场获得,其利率远远高于约3%的阿根廷市场利率,并且会随着地价的上升而同步上浮^③,这就给佃农带来了较大的还贷压力。

面对地租与生产成本的重压,唯一能够让佃农期待的是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与国际市场的价格稳定。在1912年前,由于粮食价格接连几年出现大幅上涨,佃农们为此深受鼓舞,并通过借贷不断扩大承租土地的面积。然而从1911年开始,阿根廷的农业生产接连遭遇了几次重大挑战。1911年,阿根廷粮食种植区受到洪灾的冲击,谷物收成从1910年的450万吨大幅下降至71.3万吨,佃农们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到了1912年,虽然当年谷物大丰收,粮食收成达到创纪录的750万吨,但谷物的过量供给又导致国际市场上价格大跌^④,佃农们非但无法获得收益甚至还无法弥补上一年度的损失,大量佃农因无力偿付地租和贷款而面临被逐出土地的风险。

传统上,佃农这一群体很难被组织起来。一方面,农村的居住点间距离

^{①②} Aníbal Arondo, “El Conflicto Agrario Argentino de 1912. Ensayo de Interpretación”,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20, No. 79, October – December 1980, pp. 369 – 370, p. 370.

^③ Jeremy Adelman, “Agricultural Credit in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1890–1914”,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22, No. 1, February 1990, p. 84.

^④ Carl Solberg, “Rural Unrest and Agrarian Policy in Argentina, 1912–1930”, 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3, No. 1, January 1971, p. 23.

较远，佃农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宣传中心；另一方面，佃农群体也存在着较多的利益竞争者，包括地主、信贷商、短工等群体都同其存在着利益纷争^①，这也使佃农面临多方的掣肘。此外，大部分佃农来到阿根廷的主要目的仅仅在于赚钱后回国，对于政治和社会运动并不关心。即使到了 19 世纪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跟随欧洲移民传入阿根廷，并建立了一些工人组织，但鲜少有佃农加入，佃农在政治上因此也就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相对早期到来的移民而言，自 19 世纪末开始进入阿根廷的移民也有自身的一些特色。一是不少移民经历过欧洲农民运动，具有罢工及社会抗争的经验^②；二是佃农之间并非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同乡之间通常会成立互助组织，包括意大利协会、西班牙协会等互助会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佃农们依靠这些互助组织开展日常文娱活动、教育后代，也通过这些组织分散风险，而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协调发起阿尔科塔农民运动的关键力量。

（二）阿尔科塔农民运动的爆发及其影响

同圣菲省的其他地方类似，阿尔科塔位于粮食生产地带，以生产玉米为主，共有佃农约 2000 户，其中意大利移民 1500 户，西班牙移民 500 户。^③当地的佃农需要缴纳的地租租金高达收成的 38%。在 1911—1912 年间接连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地主们非但没有减免任何租金，还对佃农们要求降低租金的请求持强硬立场。为此，在意大利互助协会和教会的协调下，佃农们开始进行秘密协商，以谋求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1912 年 6 月 25 日，阿根廷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佃农罢工，要求改善其境遇，史称“阿尔科塔的呼声”。佃农们提出六点基本要求，其中包括：订立书面契约，且土地租赁时长至少为四年；租金下降为净收成的 25%；自由支配打谷机等农机设备；享有免费支配 6% 的土地进行放牧的权利；不可扣押农具及种子；在当前情况下停

^① Jeremy Adelman, “Una Cosecha Esquiva. Los Socialistas y el Campo Antes de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en *Anuario del IEHS*, No. IV, Tandil, 1989, p. 317.

^② Carl E. Solberg, *The Prairies and the Pampas: Agrarian Policy in Canada and Argentina, 188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47.

^③ Karina Bidaseca y Pablo Lapegna, “El Grito de Alcorta Revisitado: Cultura y Sentimientos en la Acción Colectiva”, en *Anuario de la Escuela de Histori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Rosario*, No. 21, 2006, p. 316.

止驱逐佃农，并保证不对参与抗争的佃农进行报复等。^①

受到阿尔科塔农民运动的影响，佃农们的罢工很快从当地蔓延到圣菲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以及科尔多瓦省、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拉潘帕省的部分地区，受到的社会关注日益增多。阿根廷社会党在其资助的媒体《先驱报》（*La Vanguardia*）上广泛报道了这一农民运动，并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②而圣菲省的当地媒体《资本报》（*La Capital*）则表示：“对于我们而言，今天的农民罢工是一种新现象，因此也就比其他的问题更危险，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③正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保守派精英所指出的，农村中的对抗着实令人担忧，这场罢工已经演变成一场“颠覆性运动”。^④

面对突如其来的佃农罢工，阿根廷保守派内部对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陷入争论之中。地主阶层普遍要求执政党民族自治党把持的联邦政府进行干预，但培尼亚总统却并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尽管其支持者主要为大地主阶层，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却显得较为微妙。一方面，阿根廷在1912年2月刚刚通过《萨恩斯·培尼亚法案》，这部法案实施后，激进党赢得了圣菲省的执政权。如果联邦政府贸然进行干预，容易受到激进党的指责，进而使其陷入被动。另一方面，这次事件也是对激进党的一次挑战。能否妥善处理执政后的农村乱局不仅关系到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也是对其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为此联邦政府倾向于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

激进党人同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尽快平息事件，激进党控制的圣菲省政府成立了由该党三位领导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并在一个月内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基本支持了佃农们的主张，要求地主同佃农进行协商，重新谈判承租合同。在这份报告的激励下，佃农们纷纷要求地主做出让步，尽管地主阶层对此感到忧虑，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意将承租土地的租金下降为粮食收成的30%，承租期限延长为最低三年^⑤，这场跨越潘帕斯多个省

^① María de los Angeles Serra, “1912: ‘El Grito de Alcorta’. Las Repercusiones en Pueblo Colazo (Cepeda)”, en *Historia Regional*, Sección Historia, No. 21, 2003, pp. 71–73.

^② Richard J. Walter, “The Socialist Press in Turn-of-the-Century Argentina”, in *The Americas*, Vol. 37, No. 1, July 1980, p. 15.

^③ Gabriela Dalla Corte Caballero, “María Robboti y el Grito de Alcorta. Testimonios Orales, Historias Vivas y Agitación Agraria”, en *La Aljaba, Segunda Epoca*, Vol. XVII, 2013, p. 77.

^④ Carl E. Solberg, *The Prairies and the Pampas: Agrarian Policy in Canada and Argentina, 188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0.

^⑤ Alejandro C. Tarruella, *Historia de la Sociedad Rural Argentina*, Buenos Aires: Planeta, 2012, p. 223.

份的佃农罢工才在 1912 年 8 月中旬后逐渐停歇。

然而，这场罢工的平息并没有真正解决地主阶层与佃农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地主们做出的妥协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佃农，让他们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播种季尽快恢复生产。从此后的执行情况来看，大部分地主并未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合约，这也使佃农们感到极大的不满，进而导致佃农的抗争在拉潘帕省等地变得更为激烈。另一方面，激进党政府并没有将双方协商的结果制度化，以规范农业租佃制的实施。实际上，在 1912 年的地方选举中，激进党并非依靠佃农的选票来赢得地方政权，他们做出支持佃农的决定与其说是为了佃农的利益考量，倒不如说是希望尽早平息农村中的纷争，这就给矛盾与冲突的再次涌现埋下了隐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粮食生产地带的佃农罢工再次爆发，并在此后持续出现。农业租佃制至此成为阿根廷国内的一项重要议题，社会党人多次在议会中提出相关法案，直到 1921 年激进党执政时期才首次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了限定。

事实上，阿尔科塔农民运动以及此后的佃农罢工给阿根廷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阿根廷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牧业的生产与出口，受到欧洲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农牧业出口本已陷入困境。伴随佃农罢工的屡屡发生，以农业租佃制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不再是佃农稳定从事生产的源泉，这就加剧了农业的生产性危机，导致农业生产与出口一度失去了活力。至 1917 年，农产品在该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经下降至 26%，远远低于先前的比重，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逐渐从繁荣转向萧条。在 1913—1917 年间，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了 8.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约 34%，成为该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程度最深的一场经济危机，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 2001 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① 这场危机从 1913 年一直持续到 1917 年年底，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大量失业，城乡土地价格的下跌，引发大量的破产和严重的信贷紧缩。^② 对于执政的民族自治党而言，建立在农牧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上而持续垄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一定冲击，这就为阿根廷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塑创造了条件。

^① Claudio Belini y Juan Carlos Korol, *Historia Económica de la Argentina en el Siglo XX*,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2012, p. 40, p. 26.

^②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5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428—429 页。

三 政治权力重构与激进党的崛起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阿根廷的权力格局呈现出两大突出特征。一是政治权力为大地主阶层所掌控,掌握土地资源和农牧业生产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关键。例如由大地主阶层创立的阿根廷农村协会曾长期垄断农村社会中的各种权力,进而对阿根廷的政治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在20世纪后,1910—1943年间阿根廷9位总统中有5位为该组织的成员,被任命的内阁部长中超过40%来自该协会,14位农业部长更是有12位来自该协会^①,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二是作为寡头集团和大地主阶层利益代表的民族自治党在阿根廷各级政府中长期执政,直到1912年后反对党才逐渐在阿根廷各地掌握政权。在1912年前,一方面由于阿根廷经济保持着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不同阶层基本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这就使阿根廷社会整体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大多数民众对于政治性事务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一般情况下选举投票率约占有选举资格人口的10%~15%。即使在政治热情高涨时,投票率也仅为20%~25%,且农村地区的投票人数要比城市高得多,这就使民族自治党能够通过包括选举舞弊在内的各种方式赢得胜利。^②

然而,随着阿尔科塔农民运动的爆发以及佃农抗争的持续发生,阿根廷原有的稳定状态与权力格局也逐渐出现变化。首先,在农村社会中由阿根廷农村协会所垄断的权力格局被打破,阿根廷农业联合会(Federación Agraria Argentina)成为另一支重要的力量。该组织创立于阿尔科塔农民运动期间,在成立之初主要活跃在圣菲省、科尔多瓦省等粮食生产地带,成员大多是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多为中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旨在推动阿根廷土地制度的改革。该组织的创立很大程度上将阿根廷农业生产中的核心力量团结起来,有力地提升了佃农对抗地主的能力,进而削弱了地主阶层对于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大量地主因此将该组织视为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威胁,

^① Peter H. Smith, traducción de Graciela Sylvestre, “Los Radicales Argentinos y la Defensa de los Intereses Ganaderos, 1916 - 1930”,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7, No. 25, April - June 1967, p. 804.

^②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 第388页。

甚至在1916年暗杀了其一位主要创始人弗朗西斯科·内特利（Francisco Netri）。^①而农村社会的权力分化也给其他政治势力的渗透提供了契机，包括社会党、南方同盟（La Liga del Sur）在内的反对党都试图在中小农业生产者和佃农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内特利还在“阿尔科塔的呼声”爆发后写信给社会党党首胡斯托（Juan B. Justo），以寻求社会党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引^②，这就给原本以农村社会为主要执政基础的民族自治党带来了挑战。

其次，由于阿根廷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执政党面临更为频繁的社会抗争。早在19世纪90年代，同样在经济危机的助推下，阿根廷政坛涌现出包括激进党、社会党在内的反对派力量，以挑战民族自治党对于政治权力的长期垄断。尽管在民族自治党的操控下，反对党的政治空间较为有限，在1912年前的各项政治选举中无法赢得胜利，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进入20世纪后反对党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支持力量。激进党的支持力量被认为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内陆以及沿海地区的粮食生产地带新兴的地主阶层，他们拥有了经济上的实力，但在政治上依然为传统的大地主阶层所排斥；二是为传统政治力量所忽视的城市中产阶级；三是在发展进程中无法分享经济红利的社会群体。^③而社会党的支持力量主要为首都圈的工人阶级，他们为此提出了包括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目标，以赢得这一群体的支持。此外，社会党还将移民作为政治动员对象，并提议对在阿根廷居住满一年的移民给予公民权^④，以此扩大该党的政治基础。然而无论是激进党还是社会党的支持力量，都无法通过正规的政治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他们只能通过罢工、骚乱等方式进行抗争，以谋求自身境遇的改善，这就给阿根廷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动荡与失序。

在1913—1917年间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些为精英阶层所排斥的社会力量生活境遇变得更为艰难，发起的社会运动也日渐增多。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中，短工与佃农的抗争使农业生产变得愈发困难，致使大地主阶层对于日益

^① Carl E. Solberg, *The Prairies and the Pampas: Agrarian Policy in Canada and Argentina, 188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3.

^② Jeremy Adelman, “Una Cosecha Esquiva. Los Socialistas y el Campo Antes de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en *Anuario del IEHS*, No. IV, Tandil, 1989, p. 293.

^③ Peter H. Smith, traducción de Graciela Sylvestre, “Los Radicales Argentinos y la Defensa de los Intereses Ganaderos, 1916-1930”,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7, No. 25, April-June 1967, p. 798.

^④ Oscar Cornblit, “Inmigrantes y Empresarios en la Política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6, No. 24, January-March 1967, p. 675.

增多的社会抗争感到忧虑与不满。大地主阶层为此开始考虑改变对于民族自治党的支持，转而寻求同当时最大的反对党、以伊里戈延为核心的激进党人进行合作。有学者指出，伊里戈延赢得其地位一半是靠自己的努力，一半是靠老统治阶级的礼让，他被授权是有很高条件的：必须维持现状，同时减少民众的骚动。^① 而统治集团则利用激进党人的革命观点和沉迷于武装暴动的特点试图向公众表明，如若激进党上台将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②，对于社会动荡的担忧在当时构成了社会的主要关注点。

事实上，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之所以能够在乱局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并赢得1916年的大选，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在于传统上认为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激进党的政治策略在其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策略也恰恰反映了该党所具有的民众主义色彩，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见主张的模糊性，二是强调民族主义的策略。

第一，政见主张的模糊性，试图构建起多阶级的权力基础。同激进党相比，当时的主要政党都具有较为明确的政见主张以及支持群体。例如执政的民族自治党以寡头集团、地主阶层等精英群体为权力基础，但对于新兴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影响力；而社会党以工人阶级为权力基础，但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外的选民以及农村群体并没有号召力，该党在拉普拉塔地区的领导人甚至对社会党中央对于农村选民的忽视公然表达不满。^③ 然而就激进党而言，该党并没有明确的政见主张，唯一坚持的政治目标就是公正、自由的选举，终结传统的庇护政治体系，并建立一套完全建立在功绩基础上的新体系。^④ 社会党为此抨击激进党和保守派的政见并无太大差别，甚至还强化了伊里戈延的个人主义色彩。^⑤

然而，这种政见主张的模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超越阶级范畴的不同群体的支持，知识分子、中小农业生产者等新兴阶层都能被聚拢到这一

①②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36页，第397页。

③ Jeremy Adelma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Argentina in the Ag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 No. 2, May 1992, pp. 231 - 232.

④ David Rock, "Machine Politics in Buenos Aires and the Argentine Radical Party, 1912 - 1930",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 No. 2, November 1972, p. 243.

⑤ Richard J. Walter, "Elections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 During the First Yrigoyen Administration: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8, No. 4, November 1978, p. 611.

政治目标下，同时也回避了对于原有统治阶层核心利益的挑战。正如法国政治哲学家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指出的：“民主制度开创了一个人们无法理解、无法掌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民据称是拥有主权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人民的身份内涵总是持续引起公开争议。”^①

实际上，在激进党执政后，该党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先保守派的施政方略。一是大地主阶层依然是决定国家政策的重要力量，以农牧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方针也并未发生改变。在伊里戈延的第一个任期内，8位内阁部长中有5位来自阿根廷农村协会，众议院44名议员中有13人是该协会会员。^②激进党政府也依旧延续着传统的经济政策，尽管该党更注重经济资源的分配以及加强对外资的控制。^③有学者因此提出了“大延误”（gran demora）的观点，认为阿根廷在1914—1933年间丧失了经济转型的机遇^④，这与激进党政府对于原有政策的继承有着一定关联。二是在政治手段上，激进党也延续着传统庇护主义的策略，依赖庇护关系网络维系政治权力。在城市中，激进党依赖“街区考迪罗”（caudillo de barrio）来维系政党与选民的关系^⑤，并在选举前通过提供食品、就业、医疗等社会福利吸引选民；而在农村社会，激进党内的医生群体则扮演着乡村“考迪罗”的角色，通过向农村选民提供当地欠缺的医疗服务进而将其转化成政治资源。^⑥此外，激进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同样较为集中，伊里戈延长期垄断着该党的权力，这也导致该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分裂为伊里戈延派和反伊里戈延派。^⑦因此，激进党所谓的同原有政治体系的切割更多只是一种话语政治，其目的在于构建起更广泛的权力基础，以赢

① 转引自[德]扬—维尔纳·米勒著，钱静远译：《什么是民粹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91—92页。

② Carl E. Solberg, “The Tariff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1916–1930”,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3, No. 2, May 1973, pp. 264–265.

③ Richard J. Walter,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Argentina’s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1912–42”,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4, No. 4, 1984, p. 717.

④ Noemi M. Girbal de Blacha, “La Granja: Una Propuesta Alternativa de Coyuntura para el Agro Argentino (1910–1930)”, in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Vol. 14, No. 28, 1989, p. 74.

⑤ David Rock, “Machine Politics in Buenos Aires and the Argentine Radical Party, 1912–1930”,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 No. 2, November 1972, p. 247.

⑥ Richard J. Walter,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Argentina’s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1912–42”,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4, No. 4, 1984, p. 733.

⑦ Joel Horowitz, *Argentina’s Radical Party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1916–1930*,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8.

得政权。

第二，强调民族主义的策略，运用身份政治吸引新兴选民。^① 对于阿根廷而言，随着移民不断进入，本国公民与外国移民之间的矛盾被逐渐放大，这就构成了阿根廷国家建构的新议题。早在19世纪末，就有阿根廷政治家感叹道：“我们将被迫成为一个年均接收50万移民的中心，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觉这个国家将会变得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征，甚至没有自己的旗帜。”^② 而到了20世纪，一方面，移民群体在阿根廷社会中的财富数量开始接近甚至超越本国公民，例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移民中中产阶级的人数多于本国公民^③，这就使本土社会对于移民的排斥感增强；另一方面，受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移民群体要求改善其境遇的社会运动也趋于增多，造成阿根廷国内冲突加剧。阿根廷统治阶层甚至认为移民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④，进而先后在1902年和1910年颁布了《居住法》和《社会防御法》，授权政府将扰乱公共秩序的移民驱逐出境。而在阿尔科塔农民运动期间，参与佃农抗争的群体也基本为外国移民，本国农业生产者同外国移民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也加深了相互间的隔阂。

在1912年《萨恩斯·培尼亚法案》颁布后，不同政党间就究竟该如何定位移民群体出现了差异化的考量。就民族自治党而言，尽管他们担忧移民的大量到来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但作为大地主阶层的代表，他们关注的首要目标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资源能够保持充足供应，因此对于移民持欢迎态度；而社会党长期将移民作为政治动员对象，他们将说服移民加入阿根廷

^①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民众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拉丁美洲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民众主义运用民族主义的策略更为主要的目的在于建立起一种“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排他性关系，即使是针对外部势力的攻击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指向那些同外部势力有联系的国内力量。而民族主义更为主要的是一种集体身份的象征，在本国内部并不具有排他性，两者的指向存在着一定差异。参见 Enrique Peruzzotti, “Populism in Democratic Times: Populism,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the Debate on Democratic Deepening”, in Carlos de la Torre and Cynthia J. Arnson, *Latin America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 69; 袁东振:《拉美民众主义的悖论:根源与后果》,载《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第143-147页;林德山:《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与欧洲未来》,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8期,第126-128页。

^② 转引自张琨:《“上帝与祖国”——试论阿根廷天主教在民族建构中的作用(1890—1930年)》,载《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0页。

^③ Richard J. Walter,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Argentina’s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1912–42”,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4, No. 4, 1984, p. 712.

^④ Blanca Sánchez-Alonso, “Making Sense of Immigration Policy: Argentina, 1870–1930”,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6, No. 2, May 2013, p. 618.

国籍以获得投票权作为其优先政治议题。^①然而在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仅有2.3%的外国成年男性加入阿根廷国籍，全国其他地方加入国籍的比重更是只有0.9%^②；即使到了1918年，在首都大约19.64万注册选民中，移民的人数也仅仅超过1.36万人^③，移民对于参与政治并没有太大的热情。面对这种状况，社会党人也颇为无奈，只能谴责移民的贪婪，指责其来阿根廷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而不愿参与公共事务^④，社会党人试图将移民转化为权力基础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回报。

相对于其他两大政党而言，只有激进党真正将移民作为一种政治议题来运作，并采取了一种强硬甚至排外的立场。例如1912年激进党在赢得圣菲省的地方选举前，其地方领导人就抨击政府将整个国家出卖给外国人，而在圣菲省最大的城市罗萨里奥市，当时的上层阶级和富有商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⑤在1914年5月，社会党在赢得众议院的首都议席后，激进党人同样把矛头指向移民，认为社会党的胜利是移民资助的产物；该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领导人甚至抛出了一连串“激进党人的思考”，质问阿根廷人是否应当来自国外。^⑥即使在1916年大选前夕，激进党党报也不忘抨击移民，在对“激进主义”进行界定中就提到，这一主义也是阿根廷人反对“忘恩负义”的外国移民的斗争。^⑦因此，移民问题成为激进党除公正选举外另一大动员选民的议题，民族主义甚至排外成为激进党上台执政前的一大标签。

实际上，激进党并非真正排斥移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一些地方，他

① Roberto P. Korzeniewicz,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State in Argentina, 1887-1907", i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8, No. 1, 1989, pp. 31-32.

② Anne L. Potter,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in Argentina 1916-1930: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3, No. 1, May 1981, p. 88.

③ Richard J. Walter, "Municipal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Buenos Aires, 1918-1930", 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6, No. 2, May 1974, p. 181.

④ Jeremy Adelma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Argentina in the Ag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 No. 2, May 1992, p. 224.

⑤ Matthew B. Karush, "Workers, Citizens and the Argentine Nation: Party Politics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Rosario, 1912-3",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1, No. 3, October 1999, pp. 599-601.

⑥ Oscar Corblit, "Inmigrantes y Empresarios en la Política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6, No. 24, January-March 1967, pp. 680-681.

⑦ David Rock, "Machine Politics in Buenos Aires and the Argentine Radical Party, 1912-1930",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 No. 2, November 1972, p. 254.

们也试图吸引移民及其后裔的支持。^① 其之所以将攻击移民作为一项选举策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移民群体并没有投票权，其后裔在20世纪20年代前也只占极小的比重，对于他们的攻击不会造成选票上的受损，相反还能构建起身份政治的议题，从而吸引本土选民，特别是生存境遇尚不如移民群体的中下层选民的支持。二是对于移民的攻击更是对执政党吸引移民政策的批判，让公众意识到执政党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移民的涌入发生在民族自治党执政时期，这些移民的到来给阿根廷社会带来了诸多影响，其中就包括对本地社会造成的冲击。激进党试图将这种不满转移到民族自治党身上，使选民认识到激进党同原有体系相割裂的立场，进而获得新兴群体的支持。而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在呼吁塑造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②，他们的主张与激进党的政治策略相契合，这就使激进党能够赢得舆论，并最终转化为选票。

从这一角度而言，激进党与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并非是现代化所带来的结果，而是能够在经济危机下迎合各阶层的期待，填补传统政治权威受侵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如同伊里戈延本人所言，激进党本身就构成了国家，它崛起于民意与公众的需要。^③

四 结论

民众主义是阿根廷政治舞台周而复始出现的政治现象，关于民众主义兴起原因的解释长期在学术界引发争论。就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而言，国内学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然而，在激进党崛起的过程中阿根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现代化转向，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权力结构基本保持稳定，国家的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而现代化本身也并不必然扩大政治参与，特别是在当时阿根廷大众尚无太大政治参与热情之时。事实上，要打破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路径依赖，导致重大变革的发生，往往需要战争、经济危机等关键性节点的出现，而在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过程

^① Joel Horowitz, *Argentina's Radical Party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1916-1930*,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0.

^{②③} Alberto Spektorowski,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The Origins of Argentina and Uruguay's Political Cultu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19, No. 1, January 2000, p. 89, p. 86.

中，1912年爆发的阿尔科塔农民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前，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牧经济的生产与出口，而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农业租佃制的形成则是确保农业生产的关键。然而，阿根廷的农业发展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随着土地资源被分配殆尽，移民的大规模进入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不断被推高，进而导致佃农在租佃制下能够实现的经济效益下降。当1911—1912年间外部生产环境出现变化时，佃农们随即陷入困境，面临被地主们驱逐的风险。为此在1912年，阿根廷爆发了首次有组织的佃农抗争，即“阿尔科塔的呼声”，给该国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冲击。阿根廷在1913年后也陷入经济危机中，原先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模式至此不得不面临调整，大地主阶层也不再能垄断农村社会的各种权力。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以经济绩效为其合法性基础进而长期垄断政治权力的民族自治党受到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政治权威遭到侵蚀，该党已无力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抗争。在这种状况下，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利用政见主张的模糊性、民族主义等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政治策略建立起跨阶级的权力基础，不仅在1912年后获得地方的执政权，还在1916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胜利，使得早期民众主义得以兴起。这就意味着阿根廷民众主义并非是现代的产物，而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重塑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也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政治现象，当商品、贸易、资本与劳动力在世界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所言，大规模移民潮将各色民族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大量外国人和原住民以及其他移民混居一地，彼此之间有的只是迥异的民情风俗，完全缺乏长久共居所凝造出的传统与习惯。^①在这种多元社会中，如何塑造一个新的国家构成了政治权威的基本任务，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在回应这种诉求，试图在不确定性中通过对权威的重塑寻找一种确定性。或许，这对于理解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世界兴起的民众主义同样提供了某种历史经验。

（责任编辑 高 涵）

^①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06页。